# 内江縣文史資料

## （第八期）

内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政协内江县委员会 编

一九八四年二月

目　录

范长江同志生平系年……黄剑庆（1）

长江流不尽　滋育后来人

——追忆老同学范长江同志……高允斌（10）

悼念韩文畦同志　韩文畦同志经历简介……本刊资料室（12）

韩文畦同志遗诗选钞……梅　英、李顺天辑（13）

悼念韩文畦同志病逝挽联（三幅）……张启荪、梅晓初（15）

武林　解放前内江“国术”开展情况点滴……王　渊（16）

武林　内江“少林五虎”与群众武术活动……隆益详（17）

·汉安诗词丛话·　十二、长江同志的心声……沈　谱（22）

·江城书画舫·　七、水墨山水画师邱特澄先生……邱与铭、丁方鑫（24）

〔花萼琐记〕（五）　乡学林著述〔书目〕钩沉（下）……洪　庐（25）

笔者·读者·编者……（30）

图片：范长江同志遗照（封二）韩文畦同志诗帖（封二）

邱特澄先生山水墨迹（二幅、封三）邱特澄先生肖像（封三）

《家常话读本》书影（封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范长江同志生平系年

黄剑庆

范长江同志，内江县人，1909年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十年浩劫中，于1970年被迫害致死。

为纪念范长江同志，现将他生平事略整理如下：

## 一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1909年10月出生在内江县赵家坝村（今田西公社七大队）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父亲，范云庵，早年做过以家庭手工纺织品的生意，后居家。母亲，是一位贤慧的家庭妇女。

范长江自幼聪慧，才思敏捷，而且勤奋好学，强记忆，1923年考入内江县立初级中学校，后又进入四川省六中。他读中学期间，大革命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对他的成长和进步有着极大的影响。那时，广东革命策源地、以及武汉、重庆等地发行的进步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内江。这些刊物，不仅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传阅，而且在一些思想激进的学生中传阅。范长江虚心好学，积极要求上进，从同学中借阅进步刊物后，很受启发，开始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1926年，在中共内江特支的领导下，内江中学发起组织了"警觉青年谈话会"的进步学生组织，他参加了这个组织，并成为一名积极分子。

1927年初，吴玉章同志所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招生，专门接收各地革命青年。当时，范长江年仅十六岁，毅然离开故乡，前往重庆，进入该校学习。不久，重庆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3月31日这天，在重庆莲花池省党部领导下，重庆各团体的工人、学员、革命群众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3月24日炮击南京事件，反对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以川滇铁路作抵押，并同美孚、亚细亚、五福、隆福等外国公司密订卖国条约，购买军火、扩充反革命武装①等罪行。以刘湘为首的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勾结地方势力，"在场外着便衣持武器者约百人左右，即乘势冲入会场，开枪乱击！"②血腥镇压人民群众。惨案发生时，范长江战斗在学生队伍中，与反动派进行激烈的斗争。惨案发生后，他在遇难战友尸首中逃了出来，星夜躲进一位

①肖波　马宣伟：《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②1927年4月8日：《国民公报》，引自《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亲戚家。这时，中法大学重庆分校也被查封，反动派四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

“三·三一”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内江后，范长江父亲写信要他立即回家，免家里担忧。范长江没有回家，他决心追求真理，要寻求一条光明的大道，便只身去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

## 二

1927年下半年的武汉，情况变化复杂。

范长江由重庆乘船去武汉，一路上得到两位同学的照顾。到武汉后，他们一起住进一所接纳中法大学流亡学生的中学。这时，汉口每天都有开大会的，游行示威的。范长江对什么都感兴趣，整天上街参加大会、游行，并散发传单。一次在法租界散传单时，还被法巡捕抓捕，因他年纪小，问不出什么名堂，才将他放出来。

但是，时局的变化，对于范长江这样一个小青年来说，对形势还是摸不大透的。他初到武汉时，还在宣传拥护汪精卫，时间不久，汪精卫却与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屠杀，致使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范长江每天都要发现宿舍里少人，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剩下几个人时，他觉得奇怪，问别人，才知道反动军阀许克祥的部队要打到武汉了，整个武汉在撤退，中法大学的同学，有的已经回四川、有的到部队去了。他感到回四川没有出路，应该到部队中去。当时，到部队去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一个是二十军的学兵营。教导团没有他认识的人，学兵营长谢独开是内江人，他在内江读书时就认识谢独开。因此，他到学兵营当了学兵，并立即随部队离开武汉。

学兵营由鄂城，黄石，九江等地，于1927年8月1日前，抵达南昌，并与另外两个营合编入为贺龙同志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学兵营为第三营。部队领导告诉了战士们形势变化的情况，范长江始知武汉为何一个时候一个样的真实情况。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部队，在南昌举行了震撼中国大地的武装起义。范长江所在的学兵营直接参加了起义，担任一个战区的外围警戒。起义胜利后，即随部队向南开拔。途经会昌、瑞金、汀州、上杭，至广东潮州、汕头等地。部队于十月初在潮州作战中，由于敌众围攻，学兵营作战缺乏经验，被打散，范长江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只身赶往汕头去寻找主力部队，不料主力部队已经撤走。为此，他流落异乡，生活无着落，“只得讨饭行乞过活，后重病几死，经人施治，始得救。”①

在流浪生活中，范长江没因此而对生活失去信心，他要继续生活下去。但他思想十分茫然，有许多疙瘩解不开。反对帝国主义，他明确，但国内的问题就不解了。当时，在他看来，国民党分左右派容易理会，以后又出了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尤其是在作战中，双方军队都是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而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张发奎“铁军”，又分为了两个部队，叶挺的部队参加了起义，因感到自己应该努力学习，掌握知识，以辨别是非曲直，不能盲目的干了。同时，他认为，要读书就得到上海、南

①范长江：1967年6月3日，《关于我的青年时代的历史情况的交待》，

京、北平，那些地方是新文化的中心，很多有学问的教授学者，能帮助他解决思想上一些不解的问题。可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他心里也是个未知数。

这时，为了暂时的生活和治疗身上所染的疾病，以及寻找机会到大城市，他再次进入部队医院，做看护兵，随部队开往福建。在广东与江西交界的地方，与几名想进入大城市的学生士兵战友，也是刚脱离部队一同北上赣州。到赣州后，又到另一支部队当了看护兵，并随军经江西、浙江等地，于1928年春夏间到了安徽省北部，在涡阳、蒙城一带驻扎下来。

这时，“国民党军官，嫖赌成风，得花柳病者甚多，卫生队天天为这些人治病，”① 范长江非常反感，那愿在部队久呆？一天，他看到一张撕破了的上海《申报》，上面登有一则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招生的消息，并注明食、住、衣服全由公家负责，报考资格也不限于正式的高中毕业生，有同等学历也可以。于是，他请长假，离开部队去南京。此时他还未满十八周岁。

## 三

范长江到南京后，党务学校招生考期已过，在一位四川同乡的帮助下，他住进了南京的“四川会馆”。这个会馆虽然睡地板，但不收房租费。这期间，他下功夫读书，等到党务学校再次招生时，顺利地考入了该校。

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所办的，最初的目的是培养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蒋介石兼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后，性质改为培养行政干部，分行政、财经、乡村行政、外交等系，四年毕业。学生出来后，除外交系外，基本上是县长、局长，所以，学生入校，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当时，范长江急于要读书，加之，他虽然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愿想，但还未具备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因此，入校时，同其他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他们入校的第一年课程内容，基本上是三民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内容，则是考茨基、伯恩施坦的学说，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傅立叶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范长江在广泛的读书中，发现书本上的东西，解决不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达不到他读书的目的。因此，学校更名后，他选学乡村行政系。原因是，他对当时设在南京郊区燕子矶，著名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很感兴趣，也常去参加学习，想将来也开展这样的教育活动，走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来。

但是，一接触到现实，和祖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国情，他便感到学校里说的一套全是假的，自己是又走错了路，开始思考新的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沈阳，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军队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向热河进攻。蒋介石这种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怒潮，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如此情况，中央政治学校却无动于衷。范长江愤火满腔，在一个晚上，学校晚点名后，奋然挺身而出，站在数百名同学面前，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打破了学校死气沉沉的局面。在众多同学的要求下，迫使校当局不得不同意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只准在郊区乡下活动。

为此，在范长江等同学的积极倡议下，学生们组织起来到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范长江被推举为负责人，每天率领同学们往返几十里地下乡做宣传工作。但是，学校当局是迫于学生们的强烈要求，而不得不答应的，便在学生宣传队中搞分化活动，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使一些学生不敢参加活动。学校一位头面人物还亲自找范长江谈话，对他施加压力，他从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的真实面目，深感自己受骗上当了，国民党这样搞那怎么能救国呢？！于是，他决定脱离国民党，与中央政治学校决别。当时，他认为，北平政治、学术空气最浓厚，应该去北平继续读书，寻求真理与出路。

中央政治学校是军事学校，不允许退校，他便决心设法秘密潜逃。中政校是国民党培植嫡系势力的最高学府，他就要毕业了，将来一纸文凭，即可是块飞黄腾达的敲门砖，有的同学便劝他不要离校，他却没把文凭看在眼里，也不愿在国民党的官府衙门里求个一官半职。因此，在几位同学的支持下，在一个星期日，换上便衣，离开了中央政治学校。

## 四

1932年1月初，二十三岁的范长江来到北平。最初，他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找到一个条件很差，离北京大学较近，离北平图书馆也不远的住处，开始了一边到图书馆看书，一边为国语大辞典编纂处做剪贴活的勤工俭学生活。由于干剪贴活挣的钱难维持生活，且花费时间，致使保证不了读书时间，他便给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长写信自荐，要求进馆当工人，不要工资，只给食、住和业余时间让借阅书就行了，但被回绝了。于是，他便改做了一段时间的卖面包、豆浆小伙计。再后来，靠同乡的帮助维持暂时生活。

1932年上半年，范长江是在艰苦的生活中渡过的，他感到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抓紧时间读书，他觉得要读书才能解决自己思想上的疑难，特别是要学好哲学。可是，许多哲学著作，尤其外国的，他还看不大懂。因此，他想考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考虑再三，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打定主意，写信向家里要。这是他自1927年离开家以来，第一次这样做。家里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便于夏秋际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进校后，他猛攻哲学，从希腊哲学读到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然而，这样整整半年的时间，钻在北大图书馆里，结果却使他大为失望，接触到现实问题，仍无法解决。一次，在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没有钱，铺子里却有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回答说：这不是哲学的事，学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各家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就使他更感到困惑，不愿再钻哲学了。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一带的日军敌特和卖国汉奸到处横行，民不聊生。强烈的民族感使范长江意识到，脱离实际地钻书本知识，是无法解救国家、民族的空前危机。这时，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主张参加实际的抗日工作和研究抗日问题。他走出校门，参加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活动，到了当时热河省的凌源一带，给前方的义勇军作输送物资工作。由于在战斗中，后援会的车辆、物资、人员失散，长城各口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无法越关，他只身徒步横跨过热河省，从察哈尔才回到北平。沿途所见国内一些部队士气低落，人民生活困苦，使他更加坚定了要参加现实斗争生活的信念。回北平不久，他即和几名同学发起组织了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先后到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冷口、独石口等地，慰问抗日军队。

范长江经过两次的抗日活动，也认识了抗日军队中的一些下级军人，知道了有关日军动向的一些消息，如日军积极准备西进察哈尔和绥远。于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为祖国大好河山被外人侵略而痛惜。因此，他不顾路途有多遥远，一个人又沿平绥路到包头去观看祖国这一带河山。回北平时，路过张家口，冯玉祥将军正成立抗日同盟军，召开民众大会动员抗日，他兴奋地参加了大会。他参加会还被误认为是蓝衣社的特务哩，被带到警察局的监狱里关了起来，他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一封说明自己情况的信后，才被放了出来。

范长江回到北平后，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撰写一些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新闻稿，并把主要精力转到研究抗日军事问题上。他联系到可能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在报刊上寻找有关资料加以分析研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早迟会发生，提前作些研究工作，以后定有用处。随着资料收集增多，范围的扩大，他感到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便和北大一些热心的同学，联合组织了一个取名为“1936年学会”的研究团体。意思是世界局势风云日亟，第二次世界大战必不可免，大战的爆发估计当在1936年。而“1936年学会”就是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来研究1936年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学会成立后，举行过辩论会，参加人很多，还拟定了一个相当广泛的研究提纲，在《晨报》上发表了。但是，由于每次开会，左右两派斗争都非常激烈，致使会开不下去，且无结果。他只好撤出来，自己个人进行研究。

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特别是个人的亲身实践，范长江意识到，研究工作离不开政治问题。这时，他听到一些传闻，江西的红军主张抗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天津的《国闻周报》连续刊载的“赤区土地问题”，从中发现，苏区有苏区的社会制度，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是什么“土匪”“流寇”。同时，他根据自己研究工作所得出的抗战爆发后，沿海一带不可能久守，抗战大后方将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的结论，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两个问题上：一、到江西南昌去了解红军的情况；二、到西部地区考察。

为了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范长江到了江西南昌，通过一位四川同乡的关系，秘密看到了许多中央苏区的油印宣传材料，大开了眼界。但是，由于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数以百万计的兵力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进不了苏区，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不能作全面了解，只好仍回北平。

1934年下半年，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的人找到范长江，要他为《大公报》写稿，每月固定稿费十五元，不要再给《益世报》投稿了。这纯粹是两家报社的竞争关系引起的，因此，范长江答理了大公报的要求，成为固定撰稿人。这是他投稿生涯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变化。

## 五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红军长征后，范长江要去西部考查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但是，到了1935年上半年，他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原因是没有路费和公开名义。最后，通过与报社商量，做了《大公报》旅行记者。条件是报馆对他只付稿费，给个名义，不给薪金和旅差费，同时，去的地区记者可以自己决定，但稿件

必须由记者署名，文责自负。范长江按照自己的意愿，履行报社提出的条件，于5月离开北平，经烟台、上海等地，再溯长江而上，回到故乡四川，准备西部之行。

范长江回川时，最初打算作一次环川旅行后，入西康。到成都后，偶然得到一个由成都经松潘北上去兰州的机会，便于1935年7月14日离蓉，正式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地区考查旅行。途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于9月3日到达兰州，行程三千余里。9月18日在兰州草完游记稿后，又进行了西达敦煌、玉门、西宁、北至临河、五原、包头，来回于长安、兰州、陕北等地，长达十个月的旅行生活。这时期，他写的大量的旅行记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公开称红军不是"匪军"，并以自己的耳闻目睹，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些游记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后，顿时成为畅销书，几个月内，连出几版。

西北地区旅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每月有了固定薪金，还可以开支旅费了。他在天津尚未休息，由于绥远战争，他对前线战事采访心情十分急切，赶紧奔赴绥远前线，采访了百灵庙战役，写了《百灵庙战后行》等文章，接着又骑骆驼穿行千里戈壁，到内蒙西部边陲采访，后写了《忆西蒙》等著名通讯。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不但不主张抗日，而且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事变发生时，范长江在绥远前线，他预感到中国在政治上将要发生巨大变化。为了揭示事变真相，澄清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舆论，以利于促成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他决定进西安。这时，《大公报》的态度是反对西安事变的，发表的是反对张、杨的文章，范长江要去西安，《大公报》当然不会同意。因此，他单独行动，利用各方面的关系，突破重重困难，先到宁夏，由宁夏飞抵兰州，再从兰州进入举世瞩目的西安。

他到西安后，通过杨虎城将军的关系，在杨虎城公馆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所见的公开的共产党人，也是他一生中一大跨步。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同他作了竟日之谈，首先肯定了他在红军长征路上所写的文章，然后，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渴望能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要求，得到了同意。

1937年2月6日，范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延安。2月9日晚，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范长江，与作了通宵谈话。毛泽东同志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特别是十年内战的经过，和当时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作了精辟的解讲。范长江茅塞顿开，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年来无法弄清的问题，使他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佩，打算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收集材料，准备写书，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与事业。

在当时，除美国记者斯诺外，范长江是第一个以正式新闻记者（而且是在全国有影响的著名记者）的身份进入延安的人。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他，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以利于抗日工作的开展，希望他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作用，作好宣传工作。于是，范长江于1937年2月14日回到上海。

范长江到上海的第二日，即2月15日，正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他认为这是一个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机会，在到上海的当天，即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争取发表他在延安归来的文章。当时，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思考，举棋不定，最后定下决心，答应了范长江的要求。这样，范长江把自己所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给了胡政之顶着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新闻检查所的反对，在2月15日发表了。文章一发表，顿时轰动上海，《大公报》销售量猛增。

《大公报》于当天下午送到南京，所载范长江的文章与蒋介石上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报告的内容，截然不同。蒋介石看文章后，大发雷霆，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骂了一顿。从此，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

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发表，和以后陆续撰写的文章，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于1937年3月29日亲笔给范长江写信，原文如下：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

撰祺！

弟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四时

## 六

自延安之行后，范长江才深刻认识到，要使中华民族振兴，要使灾难深重的人民获得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为此，他和党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向我北平郊区芦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这一导火线引起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这时，八路军部队已陆续开赴华北前线。范长江到前线采访，在太原会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提出要随八路军采访。彭雪枫同志电告延安，请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十分欢迎范长江随军采访，并电示彭雪枫转告范长江。从此，范长江奔波于抗日前线各战场。他采访了芦沟桥、保定等华北各战场后，又马不停蹄地转赴察哈尔、山西等西线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写了《芦沟桥畔》、《西线风云》等大量战地通讯，热情地宣传了抗战成果。接着，又从沪绕道江北，经南京到武汉，沿途报道抗战消息。1938年初至夏秋，又奔走于中原淮北、台儿庄、徐州等战场。并于3月，与徐迈进、陈同生、恽逸群等同志在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直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938年5月26日，在范长江和几十名战地记者从前线回到武汉时，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信给他，说：“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又于6月9日在汉口中街新生活宿舍，举行了战地记者聚餐会。这给予了范长江极大的鼓舞。

然而，这时的大公报老板们却忧心忡忡，对抗战悲观失望。10月，武汉处于日军威胁

下，大公报老板们要靠蒋介石这座靠山，又企图拉拢范长江，对范长江许愿，要范长江写一篇拥护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反动主张的文章，范长江不听这一套，反其道而行之，写了题为《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并在与大公报老板们的斗争中，将稿子送到胡愈同志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了。大公报老板们对此虽大为不满，但仍想拉住不放，又对范长江说，武汉撤退后，给他一个优裕条件，配一辆专用汽车，带一部电台，随蒋介石的大本营行动。范长江坚决地回绝了大公报老板们的引诱，毅然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

## 七

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同志成立了“国际新闻社”，组织进步新闻工作者，积极开展抗日新闻报道工作。由于他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他施加压力，阻绕其工作。在这严峻的现实斗争面前，他深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反动派开展斗争的。因此，1939年5月，范长江趁正在重庆工作，乃亲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同志，向党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请党组织对自己进行审查。周恩来同志当即对他表示欢迎，并立即向延安党中央汇报，不久，即介绍范长江光荣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与敌展开顽强斗争。他和胡愈之等几位同志组织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了大批进步记者，在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党的《新华日报》互相配合，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打开缺口，真实地报道抗战情况，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1940年12月，在重庆枣子岚垭的一幢小楼里，范长江与沈钧儒之女，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沈谱同志结婚，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但是，婚后仅十来天，范长江就离开了新婚妻子，赴桂林参加“国际新闻社”的年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蒋介石下令逮捕范长江。这时情况紧急，范长江在桂林的住处被特务监视，在党组织的关怀和指示下，他转移到香港，参加主办我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工作。同时，兼顾香港“国际新闻社”的一些工作。

1941年底，日本法西斯分子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范长江辗转回到桂林。不久，张友渔同志向他转告了重庆党组织的通知，蒋介石又下令逮捕他，组织上安排他到武汉附近去找李先念同志的部队，如果找不着，就设法到江苏北部去找陈毅同志的部队。为了不被敌人发觉，他留下沈谱同志作掩护，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背上简单行装，于1942年到达苏北解放区。从此，在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工作。

## 八

范长江到解放区后，先后担任过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等职，为党在华中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做出了积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1946年5月间，他由苏北到南京，参加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他做为代表团发言人之一，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和谈破裂后，范长江去到了延安。在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新华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中央宣传工作四大队队长，跟随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及时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全国解放后，范长江响应党的号召，南下到上海，担任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此后，又担任了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6年，在全国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新形势下，范长江服从组织调动，到科学技术部门工作，先后担任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参与了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织工作，和1964年、1966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性的科学讨论会和物理学讨论会，以及科学界历次重要会。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努力学习自己以前不熟悉的工作，积极为党工作。

范长江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作了大量工作，但是，竟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受尽了屈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就被当着所谓的“走资派”揪出来，受到批判斗争。并被诬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把他隔离审查，甚至把他家珍藏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写给他的信件，也当作“罪证”。后又强行押往河南确山“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0年10月23日，在残酷的迫害中，范长江含恨离世。终年六十岁。

范长江被迫害致死后，1973年毛泽东同志对他的问题亲自作了批示，使他的政治生命得到保护。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的骨灰移入了八宝山烈士公墓。粉碎“四人帮”后，经党中央批准，1978年12月27日，在八宝山烈士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和国家领导人，方毅、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廖承志、周建人、栗裕、沈雁冰、宋任穷、史良、季方等同志分别送了花圈和参加追悼会。周培源同志在《悼词》中，总结了范长江战斗的一生，他说：“长江同志由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真理的过程的。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了马列主义，认识了毛泽东思想。而一旦接受了革命的真理，就一心一意，终生为之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号召大家“要学习他不畏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坚贞不渝地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善于研究新的情况和问题的革命学风和科学态度；学习他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克己奉公，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同志满腔热忱的高贵品德；学习他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善于团结科技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

范长江同志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一直活在故乡人民心中，他们所经历的岁月和战斗过的历程，直今在故乡人民中流传，人们将永远纪念他，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发奋图强，努力奋斗！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①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通讯与论文》、《关于我的青年时代的历史情况的交代》、《关于“反共老手”问题——答若干同志问》等。

②朱辉：《范长江同志小传》。

③周培源1978年12月27日《在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④胡愈之：《忆长江同志》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⑤沈谱：《怀念长江同志》1979年1月14日《四川日报》。

⑥黎澍：《悼范长江同志》197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

⑦魏克明：《悼念范长江同志》，1978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

⑧黄药眠：《和范长江、陈同生在一起的日子里》。

⑨陆诒：《长江的风格》、《在周总理领导下做新闻工作》。

⑩高天：《回忆长江在抗战中的几个片断》等。

作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过范长城同志，梅英老师，以及赖图兰、郭少禹等老人的大力支持，仅此表示感谢。

# 长江流不尽　滋育后来人

## 追忆老同学范长江同志

高允熾

我和范长江同志（读书时学名范瑛）是在1923年秋同时考入内江县当时唯一的内江县中十六班读书的。这期考入县中十六班的学生名额超过以往任何一期，有入学新生一百二十余人。其中，来自乡镇的占了三分之二，在这批学生中知识基础参差不一，半数以上仅仅读过私塾，虽然文科底子深厚，但在数、理、化学科方面都处于启蒙状态；有少数同学来自普通小学校，理科都有一定的基础。从年龄上也差距大，年满20岁以上的在半数以上，15岁以下的只有几个人，我和范长江同志就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两个。我们之间私感甚好，开学以后不久，从范长江同志的学习态度上就闪现出思想敏锐，求知欲强，勤奋学习的特点，他除课堂上认真倾听老师讲课外，课堂以外的时间无不争分夺秒，如饥如渴地复习功课，当时同学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性格沉静死啃书本的人，事隔几十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第一期考试中他曾因自己未名列前茅而暗地抱怨。从那以后，长江同志就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和毅力，更加认真勤奋学习，决不虚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同学们早已灭灯就寝，而他却把一个放有小油灯的木凳，在被窝上“开夜车”。这样当然会引起学监老师的干预，有好几次被发现受到警告。为了要使自己的成绩更上一层楼，长江同志一反常态，对四分科（即体操、图画、音乐、美工）也不轻视。他说：“一个人学知识不但要专，而且要宽，学得很多知识

才能有本事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此后，凡是学校安排有体操、音乐等课程，他就积极参加，认真实践。曾记得当时的内江县中，虽然是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但教学经费受了限制，连开展体育活动都没有专门的场地。足球也只有一个，长江同志经常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把气鼓柑（内江人通称，就是柚子）当作足球来踢。竟致累得来通身大汗，脚趾踢肿也不善罢甘休，充分表现出他那个全面求知勇于实践的进取精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第二学年开始范长江同志的考试成绩终以出类精华的高分而名列前茅，甚至后几期名列第一。他这种对读书力争上游立志赶超的意志和精神，不得不使得一些原来自负成绩好的同学甘拜下风。特别是在班上以语文、史地见长的张善高和以数学、英文见长的刘慧两同学由衷感到赞佩。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在广州召开，当时在内江地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较早的谢独开同志曾以正式代表身分参加会议回四川，在一定范围内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并透露了即将誓师北伐的信息。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万县“九五”惨案接连暴发，更加激发了全国工、农、商、学、兵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热潮。当时由内江去京、去蓉求学的一些进步同学主办的进步刊物，如《不平鸣》、《江涛》、《江锋》如雨后春笋，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在内江中、小学师生中广为流传，其中又以在成都工科学校读书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廖恩波、朱朝璧、刘觉周等人主办的《不平鸣》刊物在县里传播更广。这对我和李元明同学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在内江县中组织了两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谈话会，一是《浚英》谈话会，二是《警觉》谈话会。参加这两个谈话会的同学除本班同学外，也有其他班次的同学参加，谈话会是不定期的，根据需要随时可以召开。每逢举办谈话会时，与会同学对当时出于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旧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无不感到忧心忡忡，讨论时慷慨激昂，捶胸顿足，大家都在探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的范长江同志已经是一个热心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了，每次开会、游行、街头讲演，他都走在前例。随着当时全国政局的影响，内江地区的民族、民主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在当时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对当地几个土豪劣绅的所作所为恨之如骨，这种情绪影响到谈话会上，自然引起了各种不同观点的大辩论。范长江同志虽然年龄比较小，因他一贯勤奋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已经是班上的佼佼者了。每次他在谈话会上的发言，不但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表现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1926年春，他鉴于县中教学设备简陋，没有正规的图书室，不能满足自己学习上的要求，加以班上有个别同学与他有私人成见，他就转学到资中省立六中读书去了。1926年北伐开始，在党的组织和发动下，黄埔军校迁至武汉，我和余农治、张善高、雷善文等四人先期赶到重庆招考，临走时曾通知他，要他赶到重庆报考。由于他赶到重庆迟了一点，人到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和余农治、张善高三人被录取，当他到了重庆我们会面时他表着懊悔不已。不久，我们乘舟东下到武汉黄埔军校入学去了，他在重庆通过黎冠英同志的介绍在吴玉章同志创办的中法大学继续上学。当时的重庆是由反动军阀刘湘所统治，白色恐怖笼罩山城。1927年令人发指的打枪赐“三·三一”惨案发生，听说范长江同志当时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在枪林弹雨中跳城墙逃命得免于难。不久他流亡到汉口，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以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份编入了当时由贺龙同志领导的20军教导团，投笔从戎，后来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武装斗争。当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革命先驱内江的谢独开同志。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阶段，我在重庆黄

责《商务日报》，他由桂林辗转到了重庆，就专门到报社找过我，据他说他当时负责“国际新闻社”的工作，由于我们既是同乡，又是中学的同学，在学生时私感甚好，彼此都有所了解，我们久别重晤，大家免不了无所不及的畅叙了一番。随着时间的流逝，几十年过去，范长江同志却不幸在过去十年浩劫中惨遭“四人帮”折磨致死。作为一个与他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我，对范长江同志一贯勤奋好学，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优秀品质，特别是他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求知精神，象滚滚长江流不尽，永远滋育着今天千千万万勤奋学习的青年学生。

## 悼念韩文畦同志病逝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常委、民盟四川省委委员韩文畦同志，原籍内江，于1983年7月28日凌晨，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病逝，终年88岁。

遵照韩文畦同志生前遗愿，丧礼从简，不开追悼会，在告别式时，由省参事室主任李振同志主持，四川省委统战部李培根部长出席作了讲话。李培根部长在讲话中，注重的讲述了，韩文畦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张澜先生等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影响，拥护、支持推翻袁世凯帝制的运动，后来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的统治深为不满，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从事民主活动。韩文畦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能大胆提出建议和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韩文畦同志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祖国的文化传统有深邃的素养，为发展祖国的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韩文畦同志一生严于律己，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简朴。他虽多年深受委屈，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未动摇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不断进步的一生。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朋友而深表哀悼！

韩文畦同志不幸病逝的音讯，传到内江后，故乡的亲友和同志们极为悲痛，深表悼念！并特向其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 韩文畦同志经历简介

韩文畦同志（1895—1983年），籍四川内江（原属内江县，现属内江市）。父亲韩仲勤习中医，初由江津来资中、内江行医，后即安家定居于内江城里，以中医内、外两科设店行业。

韩文畦同志，幼年时主要是在私塾念书，稍长乃从内江名塾师罗仲武先生之门，继续攻读。迨至青年时期，曾先考入南充蚕桑学校。出校后，学难为用，乃改学政法，另去成都，考读成都法政学堂。法政学堂出来后，走入社会，多从事于教育工作，先在内江城里中、小学校任教，旋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担任语文教员。韩文畦同志勤敏好学，国学功底深厚，在蜀中，极为时人所推重。一九三七年韩文畦同志应西康省省主席刘文辉的邀请，去西康省襄

理康政，担任了西康省府委员，教育厅厅长，锐意振兴，清廉自守。因韩文畦同志，平素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对国民党旧政权的反动腐朽，亦极为不满，经师友张澜先生的介绍，于1946年春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积极从事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工作，尤其是面临西南解放前夕，在川、康军政较上层人士中，开展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作了极大的努力。

解放建国初期，韩文畦同志曾被任命为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盟主委，并出任川西行署林业厅副厅长。合省后，1954年调任四川省绵阳专区副专员，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韩文畦同志更加勤恳，努力地学习和工作。1957年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韩文畦同志迭蒙冤屈，虽年逾古稀，身体日衰，对党的忠贞和信赖，却矢志不渝。十一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对韩文畦同志的错误处理，得到了彻底地平反和改正，只因韩文畦同志，年事已高，并发症多，终于1983年6月8日，以患“脑梗塞”在成都省人民医院病逝，卒享八十八寿高龄。　　（本刊资料室）

# 韩文畦先生遗诗选抄

韩文畦先生于古文辞，堪称国手。诗亦典雅深邃。今特将其部份诗作，先行选录，用表对先生辞世之追怀。

## 杂　咏　（七绝六首）

思无邪括诗三百，达志纾情正自嘉。
绮语夸词徒秽耳，鄙他伪体领风华。

担夫争道鼓吹喧，剑器公孙舞可观。
张旭遇之成妙悟，畴云笔诀待师传。

披襟岭望赤栏桥，月下徐来一曲箫。
心与春波流共远，等闲尘垢铸神尧。

涣为雨泽聚为云，涣聚天然匪用情。
大化运行无揀择，初寒正尔育明春。

爱花赊酒奠花神，忘却萦襟早送春。
空负诗囊溯上蹊，惭无一语对疏林。

浔阳司马今何在，水上琵琶意不遄。
未感兴亡感沧落，暗弹清泪过江南。

## 感　怀　（七绝六首）

读圣贤书旨若何，解悬济物远哗讹。
升沉显晦何堪计，嗤彼刘邦校仲多。

智仁无勇定勋难，镇乱匡危仗铁肩。
的是俊人观不屈，几多刀下化奴颜。

临身为学重开端，扩廊胸襟第贤关。
今古圣贤在心目，堕归顽儒自无缘。

先无禀赋诀心形，堕地甄陶仗友亲。
入世遭逢别通塞，阿谁曾值自由神。

求师问道乞明通，迷向翻教眼更朦。
索迹探天忘本分。乱离荆棘入胸中。

豹隐龙飞迹自殊，世升世降岂关吾。
无缘兼善惟安素，养志丘园德不孤。

## 七十自寿　（七律一首）

春过行登七十年，非关老健只成顽。
惊涛惯历难为水，歧路迷归敢咎天。
识字九流争作祟，趋尘三黜不能贤。
垂名原自输杯酒，好乞虚堂倚醉眠。

## 养生咏　（七古一首）

八十康强柳公度，自言摄卫初无术。
不以气海煖生冷，不以元神陪喜怒。
我得三忘四耐谈，忘忧忘辱并忘年。
贫病困损皆漠漠，尔为尔耳我奠然。
万化纷纷为梦过，揖让征诛酒棋若。
最切乎已惟此身，身亦刹那开复落。
人既如斯物亦然，内兴困扰外颠连。
岁月推迁本无事，空劳朝夕腾器喧。
生同泡影非虚说，前贤兢劝及时乐。
乐已由境端在心，孔颜老壮真绰绰。
显明厚实能起贪，烈士争誉夸死攫。

滔滔天下难计数，谁开道眼超童观。
惟明道者知闲味，昼送浮尘夜安睡。
莹莹此心通于天，何必登仙始为贵。

按：韩文畦先生以上遗诗，分别由梅英、李顺天两同志抄寄。

## 悼念韩文畦同志病逝挽联

### （三则）

临去序成，看笔迹犹新，明月清风人已远；
平生墨妙，写诗笺仍旧，模山范水世争传。

断无名士不萧骚，遑问他苔藓残碑，松楸旧冢；
大抵高贤多解脱，总输公鸡边卧雨，鹤外呼云。

（张启荣）

招魂沱水，想当年听琵琶写怨，白傅同舟，感时泪洒江州雨；
作赋玉楼，慨即今仰齿德俱尊，蓝关回马，化骨犹添锦里霞。

（梅晓初）

---

（上接23页）

曾说黑黄皆劣种，谁知日月换新天。
万里迢迢情同意，一心耿耿洁而坚。
春风不复归豪贵，笑看群奴舞蹁跹。

另于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人物》杂志，曾刊载介绍范长江同志1965年去浙江诸暨县参加社教运动。在途中所见所写的《诸暨颂》七律七首中之一首，统此附录如次：

## 诸　暨　颂（七首录一）

（一九六五年八月）

诸暨处处可为家，高山低湖富无涯。
稳产千斤才及半，猪户五头不为奢。
七分山地多童秃，万片水面少鱼虾。
再得经营五十载，绿水青山绕万家。

武林

# 解放前内江“国术”开展情况点滴

王渊

解放前（民国时期），内江开展国术（即武术）的活动情况，约略可分成下面的三个阶段。

## （一）一九二二年以前的“达摩会”的活动时期

这时的群众武术活动，多属民间性质，是半公开的，是由私人礼聘和私人设棚授徒，对习武界称作是“打打行”或“扁挂行。”这个时期内江城里最有名望的拳师，是银宾臣老师，这时银老师已是六十开外的年纪。银宾臣老师的出名，除了对武术的确有深厚功底外，特别是他收教了在当时社会上极为有名的两个大徒弟：一个是马星斋；一个是傅相儒（县衙门的刀把子）。两个都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后来又先后担任过内江国术馆的馆长。因此他的门徒众多，在当时武术界极有声望。此外，当时在内江城里教拳授徒的有名拳师，尚有祝自安老师在龙井沟传习；钟玉书老师在东门河坝传习；王炳银老师在盐市朱家当铺传习；张鼎君老师在南街传习；魏昌林、王渊、张吉开则从业邓丙奎老师在大西街传习，恭称银宾臣老师为银叔。学生向老师拜门，由老师每日定期传习武术外，每年达摩祖师生日，便要举办“达摩会”，由学生们凑足份金，办席聚餐，并根据学生不同经济情况，向老师送致仪礼。聚餐前先由老师作口头讲授并作一些示范指导后，并点名让学生当众表演，相互观摩。这时的“达摩会”大多是各武棚单独举行，很少联合的统一活动。

## （二）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武士会”活动时期

这段时期，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秩序很不安宁，居家、出门经常都会遭受到拉兵、拉夫和匪盗抢劫的祸害，私人斗欧之事亦经常发生。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在家庭支持下都愿通过学习武术，好用来强身自卫。学习武术的人，便多了起来。四川的军阀，侵占地盘，内战不止，打仗时必然要短兵相接，讲究格斗，因此也提倡武术，在旧军队里招聘拳师教官，操练武术。学校里开设体育课，加强学生身体锻炼，学好功课，更好为国家效力。因此四川各地普遍建立起“武士会”，内江县亦于此时正式建立，由过去的半公开，而成为完全公开的正当组织，由马星斋担任了内江县武士会的首届会长。当时曾在中、小学学校里去教习武术的有王万廷、在社会上收徒教习武术的有本地的张建之、王庆云及外地资中县下来的蔡朗轩等武术教师。蔡朗轩多教的是长脚长手，被称为北派；张建之、王庆云多教的短手，被称为南派。实际这种称法，按现在来说是不很确切的。因之武术界的宗派和门户之见，还是非常之深，有的如张鼎君、邓丙奎等老师，当时就没有去参加县武士会这个组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